



铭记海上抗战历史的光辉一页

——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军史文物



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西北的东海海域，有一个形如遨游在海中的大蓝鱼的岛屿，这就是大鱼山岛。抗日战争时期威震东海的大鱼山血战就发生在这里，它是新四军唯一一次海岛战斗，也是人民军队进行的第一次海岛作战，在军史上留下了独特而又光辉的一页。

在当年烈士血染的地方矗立着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如下：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新四军浙东纵队命令海防大队第一中队向大鱼山岛进发，在舟山开辟海上隐蔽的游击革命根据地。因敌特告密于八月二十五日，敌人拼凑一百多个日军和四百余个伪军，调遣五艘木壳机轮，二艘登陆艇和“105”号大型战舰和两架飞机，在猛力火力的掩护下包围大鱼山岛，坚守在大鱼山岛的六十四名指战员，英勇顽强地与日、伪军浴血奋战七小时，终因寡不敌众，除一部分同志突围外，三十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长期以来，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在当地发挥着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作用。

(一)

自从那场血战发生后，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岛上的居民都会把这一天作为岛上的忌日，自发来到烈士血染的地方，用当地渔民特有的方式祭奠在这里壮烈殉国的新四军战士。20世纪50年代，他们又将散葬于各处的烈士遗骨集中迁葬到当年的主战场——大岙岗，并在山项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

1988年，中共岱山县委、县政府为更好发挥遗址遗存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拨专款在大岙岗山腰上修建了这座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身呈塔形结构，用白色大理石砌成，高7.75米，占地196平方米，正面雕刻着“革命烈士纪念碑”几个金色大字；碑座正面是“大鱼山战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铭文，碑座两侧分别刻着纪念碑碑文和37位烈士的英名，尚有5位无名烈士没能刻上。

(二)

重读碑文，不禁让人回到战争岁月。1944年，为配合盟军的太平洋反攻，浙东新四军游击纵队派遣海防大队第一中队，深入位居东海要冲的大鱼山岛，开辟海上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作为海上反攻的跳板。8月21日，第一中队的64名指战员夜渡岛后，就积极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争取驻守在岛上的伪军。但他们的行动还是被奸细告了密。8月25日正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团团包围了大鱼山岛，一场血战就此展开。

这是一次兵力武器相差悬殊的战斗。我军64人，仅有机枪3挺、土炮2门、长短枪50多支，每人配备手榴弹4颗、子弹100发；而日军投入海陆空五六百人，出动舰艇10多艘、飞机2架，各种大口火炮、机关枪数十门，敌人总兵力近十倍于我，火力数十倍于我，这次战斗注定是一场恶仗。但身陷险境的新四军指战员临危不惧，迅速抢占了岛上的3个制高点，与由飞机大炮武装的敌人连续激战7个小时，击退了敌人4次疯狂进攻。

这是一次彰显气节气壮山河的战斗。大鱼山岛孤悬海上，一时间外无救兵，后无退路。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一天滴水未进的新四军战士顽强还击。子弹打完了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用石头砸，石头用完了就跟敌人展开肉搏战，抱着敌人跳下山崖滚入大海。指导员严洪珠身负重伤，仍然伏地爬行整个阵地鼓舞士气。他16岁就参加革命，壮烈殉难时年仅22岁。当日伪军占领山岗，企图活捉伤员时，一名战士怀揣两颗手榴弹跃身冲向敌群，边跑边拉动引线，炸死多名敌军，自己也当场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鱼山岗，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表现了中国人民誓死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当年驻守舟山群岛的日军头目评价说“这是日军在中国海岛作战中所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硬仗”。我伤亡之比为2:1，日军死伤50多人，伪军死伤30多人。但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一部分同志突围外，42位壮士洒下大鱼山岛，他们的英灵永远屹立在这片山岗上，守卫着海岛。

当时人们就说：“北有狼牙山，南有大鱼山”，这次战斗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事后新华社发了战报，新华社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这场重创寇敌的海上战斗，《解放日报》作了全文转载，《浙东战斗报》社为此专门出版了《血战大鱼山》连环画，还有人专门谱写了纪念这次战斗的《海防大队之歌》——“嗚呼嗚呼的风啊！白浪滔滔的海啊！漂泊在海上的船啊！都有我们同志在啊……”此战规模虽小，较少见诸史册，但其悲壮激烈却是14年抗战的一个缩影。

(三)

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

然不到200个字，但它简洁有力，主题鲜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

一是详尽叙述了事件的全部经过。纪念碑文按照内容划分，可分为纪传体碑文和纪事体碑文两种。大鱼山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属于纪事体碑文，不但说明了当年那场血战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部队、人物，而且交代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经过，使后人那场战斗了解得清楚明白，情景历历在目。

二是抒发了对革命烈士深切的怀念和敬仰之情。碑文开头点明了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和环境的恶劣，又彰显了新四军战士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接下来对敌人兵力装备的详细记录，反衬了新四军战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英勇顽强、瞻仰者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碑文最后交待悲壮的结局，又使人一下陷入深痛的追思和怀念之中。

三是激励后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新中国成立已经70多年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正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要坚定不移地沿着革命先辈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葛传彬)



党史上的第一部反腐法令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着一份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特殊文件——《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部反腐法令，见证了我们的党刀刀向内的坚定决心和依法反腐的伟大开端。

打响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第一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和苏维埃政府各级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腐败等现象也逐渐显现出来，不仅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影响苏区经济的发展，还严重损害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各种腐败行为予以批判和打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设立了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和检查，负责苏维埃工作人员贪污浪费等犯罪行为提起公诉。该部下设控告局，接受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控告事件，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把贪污分子驱逐出苏维埃。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还专设“突击队”“铁棍”“铁锤”“铁帚”“可耻的黑板”等专栏，专门刊登揭露苏维埃的各种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现象。从第56期起还专门开辟“检举运动专栏”，以推动反贪污浪费运动。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及苏区军民的支持下，反腐败运动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查处了一些贪污浪费案件。

1932年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干部谢步升因贪污、偷窃等罪行被查处，由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叶坪村，因此谢步升有些熟络关系。这种情况给案件审理带来一定阻力。对此，毛泽东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肃清，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败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的天职，谁阻挡不了！”这样一来，案件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最终，谢步



《红色中华》报刊登的反对贪污浪费、厉行节约的报道

升被依法判处死刑，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第一枪，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败的决心。

出台党的第一部反腐法令

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逐渐发现，由于缺少针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专门法令，使得此类案件的审判与量刑没有具体的量刑规定与依据，亟需出台一部专门针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

毛泽东亲自谋划、身体力行，推进党的第一部反腐法令正式颁布。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并通过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及各种训练班等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干部抗腐拒变的能力。此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率先垂范，在吃、住等方面，不享受特殊待遇，与普通干部同甘共苦，为苏区的反腐倡廉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与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等一起多次征询司法机关领导人、工作人员

及工农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标准进行了细致地调查论证，特别是在死刑的量刑上，毛泽东等人也是极为谨慎。既参考了苏联的相关法令法规，又结合苏区的实际情况。训令对犯有贪污及浪费行为的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制定了明确的惩治标准。作为党的第一部关于反对贪污浪费的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对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行为作出了具体的惩治办法与量刑标准，党的反腐败斗争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树立了清正廉洁 勤政为民的清风正气

为促进这一法令在中央苏区顺利开展，保证其权威性，《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的名义公开发布。同时，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这一法令，毛泽东还充分利用《红色中华》报这一苏区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的宣传作用，将其刊登在1934年1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毛泽东号召群众揭发腐败分子的错误，要发现一个，严惩一个，决不姑息。

此后，苏区各级司法机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充分依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

(钟军 苏春生)

中华英烈

王一飞：不为时代之落伍者

走进浙江上虞丰惠镇小庙弄6号，抬眼就能看到一幢典型的明清庭院式建筑，俗称“王家台门”，坐南朝北，青砖墙，石库门，这里就是英烈王一飞的故居。

王一飞，1898年11月17日出生。1910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他前往上海探索革命真理，开始了革命历程。

1921年，王一飞被派往苏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负责人。1924年6月，王一飞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他以中共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25年初夏，王一飞根据党的指示回国，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不久又被任命为上海区委书记，负责上海和浙江两地的党务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王一飞与陆绍莹结婚。他常对妻子说：“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庸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能，亦不愿！”

北伐战争期间，当北伐军进入江西战场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时，王一飞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赴江西前线视察，加强与北伐军苏联总顾问加仑将军的联络，多次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反映江西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就北伐军继续进攻的方针和部署，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1927年1月，王一飞回到上海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紧张地投身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并以中央军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会后被派往鄂北指导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虽然这次暴动未能实现，但他在鄂北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鄂北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0月中旬，党中央派王一飞和罗亦农前往长沙，负责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决定举行长沙暴动，由王一飞任总指挥。曾与王一飞在一起工作的刘英回忆：“在准备长沙暴动的日子里，王一飞同志亲自积极组织联系，到处奔忙，辛苦万分，经常不断地鼓励我们。”

12月10日，长沙暴动的枪声打响了。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暴动未能成功。长沙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再次笼罩长沙城。反动当局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8年1月11日，由于叛徒告密，王一飞不幸被捕。

1月18日，王一飞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王一飞牺牲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妻子留下两人合拍的照片和两人往来的51封书信。

(唐强)